

学术门径——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价值及其总纂纪昀治学良师

陈晓华

古人读书，讲“法、相、品”。法即方式方法，相就是读书之状貌精神，品即感悟书之五味，但无论哪种，其实都在讲如何读法。不过，如何读很重要，但如何才能入读书之门，更为重要，此乃读之关键，即读书首先要明白按需应读哪些书，要会按目索书。不然，纵有万般法相品，或不得要领，或终是乱读。

四库总目

对于读书治学门径，中国清人是最谙习的。他们不但作出了理论总结，也进行了实践。他们实践的最高成就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是18世纪，尤其是明代以前典籍的汇总，以分类体系，书目著录的取舍，简练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古代学术源流、各书作者的事迹、内容正误、价值高低，辨汉宋儒之是非，析诗文流派之正伪，主持风会，斟酌古今等，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。乾嘉之后辈出的通儒、近代以来如陈垣、余嘉锡等不少大学问家，都无不得益于它。此外，它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了古代目录书的最高水平，集中展示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，影响了后来许多目录书的编纂。当今整理古籍，四部分类法仍是最好的编纂方法。

当然，读它，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它对读书治学引领门径之功，还可见到其对学术文化、甚至思想的领航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，次考本书之得失，权众说之异同，以及文字增删，篇幅分合，详为订辨；四部之首，各冠以总序，概述其源流正变，以挹纲领，四十三类之首，亦各冠以小序，详述其分并改隶，以析条目。如其义有未尽，例有未该，则或于子目之末，或于本条之下，附注案语，以明通变之由。所以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不仅仅是目录之书，还蕴涵着时代，以及时代中闪过的人物，展示了岁月的悲欢，尽显历史的厚重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时代是乾隆时代，也囊括了此前诸时代。是乾隆时代的四库馆臣们立足本时代，感知品赏各代，点评各代江山、人物风情、学术文化、国策大政，赋予各代意义和悲欢离合的集大成之作。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相关的人物，既是它所著录的书人物，也是用自己的笔书写这些人物的馆臣们。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是纪昀一手裁定的，因此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可视为纪昀的作品。孟子道，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？所以，我们要先看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重要人物——纪昀。

纪昀其人

与他的亲家卢见曾、门生洪亮吉相比，纪昀无疑是非常幸运的。他们三人都被滴戌过，但纪昀的滴戌，总共不到2年。这其实犹如出了

一趟远差，这趟公差是为天子刻意安排的一次锤炼。以此为界点，纪昀从此一帆风顺，仕途通达。经历这次滴戌，纪昀更懂得变通、承领圣意。对他而言，这次滴戌，更大的收获是，他的视野得以开阔，心胸得以开拓。对他自己而言，这次滴戌是他日后发达必备的前课。就四库修书而言，这次滴戌酝酿了修书所需要的包容百家、整齐各派的雄心，成就了与四库修书相始终、却不至于落得如他的四库馆同事陆费墀那样惨局的智慧。并且他所任几乎都是清贵显要之职，且多扈从皇帝，备皇帝顾问，是乾隆身边随身带的文词经学之士。乾隆对他确实恩宠有加，巡视也多带着他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伴驾热河，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伴驾南巡，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伴驾热河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伴驾第五次南巡，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伴驾第六次南巡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，纪昀因次子犯罪被牵连，处以降职调任，乾隆知道后改判为降三级留任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，他还参加了乾隆在乾清宫摆设的千叟宴。四库修书期间，虽然多次记过赔写罚款，但都无恙。所以四库修书期间，纪昀对乾隆感激之至的一些言语，如“臣惟有勉竭谄谀”“恩荷高深，冀酬酬于万一”等，虽不免阿谀之嫌，但实有感而发，确存真心。毕竟乾隆对他知遇甚隆。历代士人梦寐以求的君臣相和，“致君尧舜上”，他纪昀得到了。为报知遇之恩，纪昀一生精力尽瘁其中，恪尽职守完成了四库修书。

四库馆中的几个总纂，唯有纪昀始终参与了四库修书，其升迁职位也最高。也只有他既能完成官办学术任务，又能全身。不过，纪昀虽以其非凡才气成为乾隆身边文词经学之士，是乾隆得心应手的助手，但在政事上，乾隆却称其为腐儒。但就是纪昀这样的腐儒，方能把四库修成而不被祸。

对于四库修书，乾隆倾注了高度热情，从征书修书体例到成书，无不亲览，馆臣屡辱因此不定，四库馆因之也成为时人向往的终南捷径。修书历来为中国士人的最高荣誉，但要在四库修书中保住这份荣誉实属不易。这需要技巧。纪昀就很好把握了这个度。他一方面站在当时的国家立场，弃所谓鄙诞小说不纳入四库，一方面却私自抄存甚至创作小说。在君王亲自督查把控下，不以完全的正统观念对待书籍，能做到一定的学术公正，不愧为大儒。当然，这种公正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公正，一旦涉及政治，大儒也只能折中。他在提要中大谈兼容并包，但实际上却偏好汉学，把四库馆建设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。这也正是乾隆所需要的。亦即，四库修书成功完成了乾隆所需的学术思想导向。

纪昀不阿附和珅，这令他在嘉庆朝，再获荣升，升至协办大学士，礼部尚书，管国子监。纪昀能有此圆满收官，当然还得归功于他自己的躬谨、豁达、宽厚。他每次赴任，必有诗传示同僚，以躬谨相勉。并且他不惮余力，奖掖后学。与当时的在野文坛盟主袁枚，一祠堂一民间，大力提携人才，有“北纪南袁”之称，既学问淹通，又人情练达。所以嘉庆赞之曰“敏而好学可为文，授之以政无不达”，看似与乾隆“腐儒”的评价相矛盾，其实是一致的。

四库的复杂性

纪昀一手裁定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呈现给时人后人以颇多复杂性。一方面，纪昀要体现私朝的宏阔与包容，要整齐百家，奖纳万方，不得偏私任何学术；另一方面，纪昀受制于官修，受制于自己的学术好恶。纪昀虽名义上要调和汉宋，但实际上是汉学家；此外，纪昀喜好汉学的笃实谨严、征实不诬，但却不喜它过于拘琐，思维发散不够，局于文献难以自拔。所以，对宋学，纪昀也有肯定之处。并且纪昀对于正统，只要从根本上不违背乾隆大政方针，纪昀并不执着之。他会为了己好，收存抄录四库馆舍之不顾的街谈巷语神异之流书籍，甚至偷偷带回家据为己有。这些思想和文化气质，都通过纪昀裁定提要内容时，反映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中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就见证了时代及其人物、隐舍岁月的悲欢，承载了历史的厚重。

东晋兴衰的启示

冯敏飞

两汉之后，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。所谓“五胡乱华”，是游牧民族趁西晋“八王之乱”进占中原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。那些割据政权大小各异，共同点是与汉人政权对峙，甚至要争“中国”之正统。在这个阶段，与北方诸政权对峙的东晋，如果积极自我革新，谋定大志，在适当的时机北上，并不是没有机会收复中原的，但是东晋几代君臣普遍偏安江左，把政权的安危寄托在“幸运”之上，即使有几次侥幸的胜利，其成果也付之东流了。

（一）

氏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。皇帝苻坚从小有异志，8岁时向爷爷请求给他找家庭教师，爷爷惊喜地道：“我们从来只知喝酒吃肉，现今你竟有读书的志向，很好！”苻坚潜心研读汉族经史典籍，早立下经世济民、统一天下的大志。他上台后，重用汉人王猛，逐个灭除周围小国，统一北方，进而占据了东晋的蜀地，随后就打算直扑东晋。

苻坚命苻融、慕容垂等将军以25万步骑为前锋，自己亲率60余万戎卒及27万骑兵为主力，直抵淝水东岸，隔河眺望东晋寿阳城。不知为什么，苻坚忽然想起朝中的反对声，觉得晋兵布阵严整，连城北八公山上的风吹草动也像伏兵，不禁起疑：“都是劲敌啊！”如果不是偶然这么一望又一疑，战局可能不一样。

东晋这边，兵力仅凑了8万，相差过于悬殊。晋将桓冲不禁长叹：“谢安是位好宰相，却不是好统帅，我们要成秦人的俘虏了。”首战即告败，守将送出急报：“今贼势盛而我粮尽，恐难见大军了。”不巧，这急报被前秦截获。于是，苻坚改变战略，先礼后兵，派人去劝降。

巧合的是，苻坚委派的这位劝降使者朱序，是前不久的降将，他的心并未归降。他回晋营后立即建议：“我们应当趁他们大军未集结之时，速战速决。如果重挫敌人前锋，我们就得救了。”东晋大将谢石觉得有理，采纳了建议。

东晋遣使到秦军下战书说：“两军隔河相对是持久之战。如果你们想速战速决，就请后退一步，让我们渡河来决战。”苻坚又开始自负了，下令说：“不妨将计就计。我军只要退一点点。等他们渡河到一半，我们突然袭击，轻而易举就能把他们全歼！”没想到秦军一退就乱，更没想到朱序趁机大喊：“秦军败了！秦军败了！”前秦兵听了争相逃命，自相践踏，不可收拾。晋军乘势追击，结果前秦不仅大

败，而且分裂成十个小国。虽然现代史学家认为，“淝水之战即使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，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极大地夸大了”，但这不影响我们设想：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偶然，淝水之战后东晋不亡也衰。

（二）

其实，东晋本身是侥幸的产物。历史上，南北方也常发生冲突。中原偏好“华夷之辨”，长江流域的楚国被蔑视为“南蛮”。武汉人迄今有句口头禅“不服周”，就源自于两千多年前不满西周王朝封的末等爵位。后来，三国时期的吴国代表南方与北方抗衡。东晋只是将吴都建业改名建康，而疆域大致与吴相同，对于北方的情绪也相似。有童谣唱道：“鸡鸣不附翼，吴复不用力。”吴人念念不忘复国。

北方遭到更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，不得不南移，与“南蛮”为伍，好不尴尬。司马睿初到江南时，相当于统率江南方面军的总司令，他算是皇族，也不免心虚，坦言：“寄人国土，心常怀惭。”当地名流迟迟不理睬他。幸好他带了一个更大的名士，这就是王导。王导出身于北方第一贵族“琅邪王氏”，早年就显露出将相之才。他与司马睿关系极好，目睹西晋末年之乱，他奉劝司马睿尽快回藩国，并用计团结江南名流。正是在这些名流的支持下，司马睿才站稳脚跟。及西晋亡，司马睿称帝，建立东晋。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中评论说：“晋元帝司马睿能在北方局势恶化以前，时间与条件都尚未不利到被当地拒绝之际，抢先到达江南，可谓与西晋创业同样幸运。”

为了与南方人和睦相处，王导的策略是“镇之以静，群情自安”，就是尽量满足大族的要求，朝廷尽量不干涉。王导晚年还自鸣得意地说：“人家讲我糊涂，我想将来会有人感激我这糊涂。”王导死后，谢安成为顶梁柱。谢安也是豪门大族出身，也是大才子。他的策略与王导如出一辙：“镇之以和静。”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初的“无为而治”。实际上，诸多帝王开国之初的国策都是休养生息，尽量少折腾。

但是，历经一两世后，积弊增多，则非改革不可。东晋却迟迟不见什么更张，没什么主动大作为。有一次，王导派巡视组到各地巡察，回来一个个汇报各地的问题，唯独一人一声不吭。这名官员叫顾和，王导问他：“你没听说什么吗？”顾和回答：“贤能的辅佐，宁可漏网吞舟，也不要听信社会舆论！”对此言，王导大加赞赏。

不难想象，漏网吞舟之鱼多了，小鱼小虾会是什么生存状况。王导可

以继续装糊涂，但蝴蝶之风终会掀起巨浪，让他们有惊醒的一天。五斗米道徒孙恩，在海岛率百余人起事，其他7郡纷纷响应，不到10天即增至数十万众，杀至官吏家中，连婴儿也不能幸免，可见积怨多深。所幸五斗米教最后被官军所灭。

（三）

百年东晋，内乱此起彼伏。王敦是王导的堂兄，在西晋就官至扬州刺史，与王导一起辅佐司马睿建国，掌控长江中下游军队，统辖州郡，自收贡赋。东晋安否，得看他的脸色，但他脸色并不好看。王敦不满朝政，便以清君侧之名向朝廷举兵。结果官军大败，司马睿束手无策，只得厚着脸皮对王敦说：“快快撤兵，否则我就回琅邪，你来当皇帝！”幸好王导坚定维护司马睿，王敦心虚了，这才见好就收。不久司马睿病逝，其子司马绍继位，发兵征讨王敦，王敦领兵再逼京，矛头直指司马绍。但王敦命有不济，突然生病，王导则趁机率族中子弟为他发丧，让大家误以为他死了。官军听到消息后斗志高昂，才趁势平息了这次叛乱，不久他也真病死了。

王敦之后，桓温又兴起。桓温是司马绍的驸马，他前期运气好，南征成汉时，战略本来是兵分两路，谋士袁乔临时建议：“兵分两路，众心不一，万一有偏差，将误大事。不如全军而进，抛弃灶具，只留三日粮，破釜沉舟，必定可胜！”桓温依计得以顺利抵达成都。决战之时，晋军前锋失利，众兵即想后退。在这千钧一发时刻，鼓手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，一失误播响了进军鼓，众兵听后士气大振，袁乔乘势指挥冲锋，大破敌军。最终灭了后汉。

桓温由此名声大噪，可是，功高盖主的老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新皇帝又开始提防打压他。他建议紧接着北伐，收复故国，理论上说这是大快人

心之事。可实际上，阻扰北伐的势力更大。一些拥护北伐的人真的动议北伐时，又遭到重重阻碍。直到北方的后赵皇帝病死，诸子争位，关中大乱之时，东晋朝野一致认为机会来了，皇帝这才同意北伐，可是仍然不用桓温，起用的却是酷爱《老子》、隐居十年的殷浩。殷浩联手羌人姚襄北伐前秦，进攻许昌、洛阳，遭到失败。次年再伐，没想到姚襄叛变，晋军又中敌军之计，致使万余人被杀。桓温上表弹劾，朝廷只得将殷浩废为庶人，换桓温统军。结果，桓温一举收复了洛阳。桓温建议将东晋国都迁回洛阳，那将有利于进而收复整个北方，可是朝中依然反对他的建议。后来，桓温独揽朝政十余年，操纵废立，直到病重时还命人给他加九锡。九锡是帝王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9种礼器。这些礼器一般只有天子才能使用，加赐大臣以表示最高礼遇。谢安等人正是反对桓温的势力，他们命人起草加九锡的策命书，一次次修改，拖了八九个月，一直拖到桓温去世。

桓温的儿子桓玄就没那么好压制了。桓玄博学多才，但受父亲牵连，一直不得志，好不容易盼到出仕，但官职只为太守，桓玄索性弃官回封地。桓玄因自己被猜忌，上疏讼冤，结果石沉大海，逼得心生异志。后来，桓玄重新入官，利用镇压叛军的机会发展壮大，入京称诏解严，并总掌国事，逼晋安帝禅让，改国号楚，彻底埋葬了东晋王朝。

“幸运女神”天女散花，有幸运也有厄运，可遇不可求。一个人尚且不可将命运押在侥幸上，何况国运。东晋的教训值得思之鉴之。



【上接1版头条】此外，东盟、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，也在推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。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、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。

【上接1版二条】革新体制机制。从现实来看，党建工作体制还不够顺、机制还不够活。党建力量配备不足，机构编制调整滞后于现实需要；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不够科学，片面强调数量；等等。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党的建设质量，要进行系统梳理，理顺体制，完善机制，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

到位，把党的建设落到实处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，就是要增强党的建设的系统性、预见性、创造性、实效性，使每项工作优质高效完成。要进一步落实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，向用人主体放权，为人才松绑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，改进人才评价机制，创新人才流动机制，健全人才激励机制，着力扭转唯学历、唯资历、唯论文等偏向，打破户

籍、身份、学历、人事关系等制约，以改革红利释放人才红利、用人才活力激发创新动力。要坚持制度治党、依规治党，着力加强顶层设计，注重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大力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，与时俱进、协同推进“立改废释”，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，加强督办督察、问责问责，增强制度的穿透力和执行

力，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衔接，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互促进、相得益彰。要把政策、制度、程序、分工有机结合起来，按照一定的规矩，创造性地工作。要完善具体落实机制，干什么、怎么干、谁来干、何时完成，都要有任务书、时间表、路线图，做到有部署、有督查、有考核、有成果。

【作者系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】